

建筑 | 城市 | 艺术 | 批评

建筑文化研究

Studies of Architecture & Culture 第2辑

主编 丁沃沃 胡 恒

2

威尼斯学派与城市

马西莫·卡西亚里

大都市

弗朗切斯科·达尔科

从公园到区域：
进步意识形态和美国城市的变革

曼弗雷多·塔夫里

杰弗逊的灰烬

胡 恒

威尼斯之梦

丁沃沃

建筑学与城市化——读“走向群岛形态”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建筑文化研究

第2辑

丁沃沃 胡恒 主编

中央编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建筑文化研究. 第2辑 / 丁沃沃, 胡恒主编.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0.8
ISBN 978-7-5117-0530-3

I. ①建… II. ①丁… ②胡… III. ①建筑—文化—
文集 IV. ①TU-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72779 号

建筑文化研究 (第2辑)

出版人 和 龔
策划人 谭 洁
责任编辑 王忠波
版式设计 刘 玮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 (100032)
电 话 (010) 66509360 (总编室) (010) 66509367 (编辑室)
(010) 66509364 (发行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010) 66161011 (团购部) (010) 66130345 (网络销售部)
网 址 <http://www.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字 数 424 千字
印 张 25.5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78.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66509618

顾问

范景中 (中国美术学院)

夏铸九 (台湾大学)

张一兵 (南京大学)

编委会

(按汉语拼音为序)

丁沃沃 (南京大学)

葛明 (东南大学)

胡大平 (南京大学)

胡恒 (南京大学)

王骏阳 (同济大学)

张亮 (南京大学)

赵辰 (南京大学)

周宪 (南京大学)

朱涛 (香港大学)

卷首语

《建筑文化研究》第一辑的主题是“建构”。这是一个学科自主性色彩颇重的专有概念。所以，这本书的内容很建筑——无论是关于材料、结构、形式的讨论，还是历史意义上的研究，都紧密围绕具体的建筑，以及建筑的具体成分来进行。形而下的物质性是这一理论模式的基础，它本是那些理论家为学科讨论所设定下的边界，但也意外导致了一个结果——相关的文本（文章、书籍、对话）都很好理解。是否专业建筑师、建筑学者并不重要，只要你对建筑有感知，就能读懂“建构”的文本。

这正是我们以此专题作为杂志开局的目的。我们希望这个刊物是关于建筑的，也是属于所有人的。当然，向所有人开放的建筑文本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也并不确定。但是，我们认为，它必然带有一种复合性。在第一期的“建构”文本中，复合性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学科探讨和经验阐述并列在一起。其二是“建构”从一种设计认识论和“微小的人工秩序”正在向城市、地景进化。这意味着本属于建筑师个体的私人对话变成一个公共行为。当然，全球化和泛都市化是这一变化的背景。这个转向实际上有点冒险，因为它表现出古典建筑思维无可避免地被当代都市意识形态所遮蔽这一残酷现实。

《建筑文化研究》第二辑的主题为“威尼斯学派与城市”。它针对的就是当代都市意识形态研究这一内容。这个主题的复合性比之“建构”尤有过之。由于城市（这里指的是大都市）自身的特点，对它的研究一开始就处于政治学、社会学和建筑学的三角框架之中。早期的城市研究大多是立足于政治学和社会学，且试探地向建筑学迈进。西美尔和本雅明都是如此。后知后觉的建筑学在进入这一领域之后也从这两人的著作中获益多多。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兴盛于威尼斯建筑学院的威尼斯学派是城市研究的一个重镇。其年轻的研究者们（主要成员都不到30岁）开启了诸多新的研究场地——苏联、魏玛德国、维也纳、美国，并对研究方法进行了探索。既然城市是复合的、多层面的，研究方法必然也要有相应的特点。传统的建筑学研究方法不敷所用，而新生的政治学、社会学方法如何介入，这显然是个难题。威尼斯学派在这一点上成果斐然。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由于该学派精神领袖意大利人曼弗雷多·塔夫里

的去世，使其城市研究大幅退潮，但是留下来的十余本充满智慧的著作却是一笔永远的财富。

本辑第一个部分里将选择收录威尼斯学派盛期的四篇论文，由该学派最重要的四位城市研究者撰写。马西莫·卡西亚里是威尼斯学派的专职思想家。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家三重身份使其理论研究发散性颇强。他在70年代关于大都会的研究对其建筑专业的同事们有着理论奠基的作用。这里收录的是其标志性的论文“大都市”。他对西美尔和本雅明的德国都市社会学的全新梳理，对大都市的综合/否定的辩证法的论证思想火花四溅，至今仍不过时。丘奇与达尔科是威尼斯学派的骨干，他们的两篇论文都相关于20世纪初期的美国城市。丘奇的“农耕理想的都市与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广亩的起源与发展”一文围绕赖特的“广亩城市”的规划方案，对20世纪初美国的边疆神话和土地政策做了一次全面的考察。达尔科的“从公园到区域：进步的意识形态与美国城市的革新”一文篇幅颇长，几乎可单独成书。其目的是在20世纪前30年里的新自由主义和新国家主义背景下，通过实例来追寻城市规划这一特定领域的几个基本概念和矛盾：19世纪神秘乌托邦、阿姆斯特德的著作、20年代的地域主义、地域主义的渐进论、新政传统……这两篇文章的文献积累极其充分，而文献诠释也相当新颖。两篇文章内容不一，讨论的中心却是相同：第一，意识形态与文化是如何被直接变换为技术并加以运用；第二，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如何通过城市结构的制约来开启其转变过程。塔夫里的“杰斐逊的灰烬”一文研究的是美国70年代纽约城市规划的一些巨大失误和同时兴起的先锋派活动之间的联系。塔夫里在此运用了法国的新批评理论。纽约的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被转化为一个有待分析的，由不同语言形式构成的文本。这是一种全新的研究模式，至今还无人能够效法。

本辑的第二部分是“城市史：东方与西方”。彼得·L·劳伦斯的“城市设计的死与生——简·雅各布斯、洛克菲勒基金会及其关于城市主义的新研究，1955—1965”一文以简·雅各布斯的名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为核心，概述了美国50—60年代关于城市研究的大体状况。这些研究有着相当鲜明的针对性——二战前后住房紧缺及粗暴的城市更新策略引发的城市危机。这是一种实用主义很强的研究路线，和威尼斯学派大相径庭。由于他们所用的资料来源都差不多（意大利人的研究都来自美国的图书馆），所以两种研究风格在此相比较相当有趣。萧玗的“《考工记》，归去来兮”以中国的古代城市典籍《考工记》为中心，探讨了美国学者、日本学者、中国学者对

之不同的研究模式的差异性，及其复杂关联，并试图从中抽离出来有效的中国城市研究策略。该文以对中国城市史研究的现当代思想史的脉络梳理作为开端，随之展开相关的细节分析。这是本专辑相当特殊的一篇关于城市史和当代城市思想史的交叉研究论文。

本辑第三部分是关于威尼斯学派两本代表著作（《设计与乌托邦》和《美国城市——从内战到新政》）的书评，以及丁沃沃对意大利建筑理论家皮尔·维托利奥·奥雷利发表于2008年的一篇文章“走向群岛形态”的延伸解读。该文宏观地分析了希腊罗马时期创造出的“都市”和“城邦”这两种初始城市原型，它们在城市史2000年流变中的形态变迁。文章的重点在于思考工业化之后城市化给城市研究与城市设计带来的挑战。作者倾向于发端于西班牙的西尔达的巴塞罗那规划的一根思想线索，并提出融合德国人翁格尔斯、意大利小组 Archizoom、荷兰人库哈斯等人优点的规划思想“群岛形态”。可以说，它是当前策略性和思想性兼备的学术探索的成果。“建筑学与城市化——读‘走向群岛形态’”是对目前最新的城市研究思想的一个小结，也是对本专辑的一个小结。

中国的都市化进程已成眼前之事实。按照现有的速度来看，不远的未来将在沿海与内地出现20多个大都市圈。高度集约的方式必然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引发大量难以预计的问题。如果回溯城市史的话，一些问题我们会感觉非常熟悉，当然也有很多问题是全新的。不管怎样，关于城市的大规模研究已经箭在弦上。这些研究会（已出现的和未出现的）问题的解答提出意见。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当下变化万状的城市形态和相关的问题本身，已经构成学科更新的主要动机和内容。无论在哪个层面，美国经验必然值得参考和借鉴。之于前者，它们都是某种意义上的“新大陆”，从人类居住的物质环境的变化之剧烈与急促来看，可能只有当年的美国和我们的现状相似，而且两者都没有欧洲文化的历史负担；之于后者，威尼斯学派在方法上的创见无疑会令我们受惠多多。这两点就是我们将之作为本辑专题的目的所在。

2010年5月

目录

威尼斯学派与城市

- 威尼斯学派的都市研究 胡恒/3
- 大都市 马西莫·卡西亚里/17
- 农耕理想的都市与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广亩的起源与发展... 乔尔乔·丘奇/53
- 从公园到区域：进步的意识形态与美国都市的革新 弗朗切斯科·达尔科/142
- 杰斐逊的灰烬 曼弗雷多·塔夫里/289

城市史：东方与西方

城市设计的死与生

——简·雅各布斯、洛克菲勒基金会及其关于城市主义的新研究，1955—1965

- 彼得·L. 劳伦斯/315
- 《考工记》，归去来兮 萧玥/345

书评·评论

- 威尼斯之梦 胡恒/359
- 社会主义视野下的资本主义城市 罗伯特·C. 旺布利/371
- 《美国城市——从内战到新政》前言 乔尔乔·丘奇等/378
- 建筑学与城市化——读“走向群岛形态” 丁沃沃/384

Contents

Venetian School and the Urban

The Urban Studies of the Venetian School	<i>Hu Heng</i> /3
Metropolis.....	<i>Massimo Cacciari</i> /17
The City in Agrarian Ideology and Frank Lloyd Wright: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Broadacres	<i>Giorgio Ciucci</i> /53
From Parks to the Region: Progressive Ideology and the Reform of the American City	<i>Francesco Dal Co</i> /142
Jefferson's Ashes	<i>Manfredo Tafuri</i> /289

Urban History: East and West

The Death and Life of Urban Design:

Jane Jacobs,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d the New Research in Urbanism, 1955-1965	<i>Peter L. Laurence</i> /315
<i>Kao gong ji</i> , Homeward Bound	<i>Xiao Yue</i> /345

Book Review & Comment

A Dream in Venice: Manfredo Tafuri and <i>Progetto e utopia</i>	<i>Hu Heng</i> /359
Socialist Views of Capitalist Cities.....	<i>Robert C. Twombly</i> /371
Introduction of <i>American City</i>	<i>Giorgio Ciucci</i> /378
Architecture and Urbanization – Review “Toward the Archipelago”	<i>Ding Wowo</i> /384

威尼斯学派与城市

威尼斯学派的城市研究

“威尼斯学派”是一个并不太精确的说法。一般而言，它指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聚集于威尼斯建筑学院（Istituto Universitario di Architettura di Venezia，简称IUAV）的一批年轻人。他们因为共同的学术兴趣和政治立场而走到一起，进行一些相似的研究与合作。马里斯泰拉·卡齐阿托（Maristella Casciato）认为，有一个事件是威尼斯学派（Venetian School）真正的确认之点。“威尼斯学派”这一术语正是自此时开始，进入了建筑词典。¹那就是1976—1977年在威尼斯建筑学院的第一个学术年。它的主题为福柯（Foucault）的《规训与惩罚》（*Surveiller et punir*）这本著作，以及相关的历史分析方法。这一学术年由曼夫雷多·塔夫里（Manfredo Tafuri）和弗朗哥·莱拉（Franco Rella）组织，马西莫·卡西亚里（Massimo Cacciari）、莱拉、塔夫里、特索（G. Teyssot）参与讨论。

可以说，这个说法是对1968年之后威尼斯建筑学院知识分子团体活动的一个阶段性总结。由于那个时代的特殊性，导致了我們通常对“威尼斯学派”认识方向的确定——马克思主义、批判哲学、阶级斗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诸如此类。实际上，在整个意大利现当代建筑、城市学术史的图景中，“威尼斯学派”还是个更为源远流长的历史概念。

我们来回顾一下威尼斯建筑学院（IUAV）的历史。IUAV的前身是“威尼斯高等建筑学校”，它是继“罗马高等建筑学校”（Scuola Superiore di Architettura in Rome）之后，意大利的第二所建筑学校。1919年“罗马高等建筑学校”创立，这标志着意大利建筑学校的诞生。该校尝试着用科学与文化相结合的课程来培养新的职业类型。在它之后，以它为典范，法西斯政权推动发展了另外四所同样名为“高等建筑学校”的高校，它们分别出现在1926年的威尼斯、1929年的都灵、1930年的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但在1935—1936年期间，除了威尼斯以外，所有的高等建筑学校都被合并到其所在城市的大学中。威尼斯的例外，也就导致了后来一直独立于城市大学

而自治的威尼斯建筑学院，亦即 IUAV。² 实际上，其独立姿态是威尼斯这座城市一贯的传统——它从文艺复兴以来就被称为是“另一个世界”。

1936年，西西里人朱塞佩·萨蒙那（G. Samonà）来到威尼斯高等建筑学校，成立了威尼斯建筑学院（IUAV）。这是一个转折。萨蒙那是西西里贵族，1922年毕业于巴勒莫大学工程系。他是一位相当出色的建筑师、都市规划专家。萨蒙那在威尼斯逐渐获得个人的声望，与此同时，他也将威尼斯建筑学院的学术与教育模式调整到自己的路子上。他打破了旧有的传统，转向现代运动，转向风格派的形式主义、赖特、柯布西耶。萨蒙那没有奉现代运动的原则为圭臬，他与现代运动建立起一种游戏关系。他用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和哲学思想来平衡现代建筑冷冽的形式品质，这使得他避开了充斥于意大利建筑界的各种风尚变化。IUAV也因此成为一个容纳多种思想的“另一个世界”。

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对于所有意大利新派知识分子来说是安全岛一样，IUAV也是相当长的时间里的异端建筑知识分子的庇护之所。在任期内，萨蒙那不仅把卡洛·斯卡帕（Carlo Scarpa）、路易吉·皮契纳托（Luigi Piccinato）和弗朗哥·阿尔比尼（Franco Albini）等杰出建筑师招揽到威尼斯任教，还对那些在其他学院（米兰工业大学、都灵工业大学等）被排挤和无法接纳的“知识逃亡者”大开方便之门。这里有塞维（Bruno Zevi）、艾莫尼诺（Carlo Aymonino）、塔夫里……可以说，从1936年开始，IUAV中就已经存在“威尼斯学派”，只不过它的形态（人员构成）在不断地变化。

1968年应萨蒙那之邀、塞维的推荐，塔夫里来到IUAV，担任建筑史教授。这是威尼斯学派的一个重大转折。塔夫里一方面和威尼斯建筑学院的左翼知识分子们建立起紧密合作的关系，其中包括卡西亚里、马里奥·托隆蒂（Mario Tronti）、托里·内格里（Toni Negri）、阿贝托·罗萨（Alberto Asor Rosa）。另一面，他迅速在身边团结起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其中既包括乔尔乔·丘奇（Giorgio Ciucci）、马里奥·伊利亚（Mario Manieri Elia）等来自罗马的追随者，也有弗朗切斯科·达尔科（Francesco Dal Co）、马可·德·米凯利斯（Marco De Michelis）等新一代的学生佼佼者。他们利用《反设计》（*Contropiano*）、《新天使》等刊物展开自己的理论建构、历史探索和政治历险。这就是经典意义上的“威尼斯学派”的诞生：一群人在一个共有的政治、文化氛围中自然形成。更为重要的是其精神领袖的出现——曼夫雷多·塔夫里。

1976年艾莫尼诺出任IUAV校长。建筑批判与历史分析系（Dipartimento di

analisi critica e storica dell'architettura) 创立, 取代了塞维 1960 年在此设立的“建筑史研究所”(Istituto di Storia dell'Architettura)。以塔夫里为中心的研究团队也有了新的成员加入, 合作模式也越发独立、细化。也正是在这一年, IUAV 开始了第一个学术年。这就是本文开头所提到的关于福柯的《规训与惩罚》的历史方法论的学术年。这是一个更新了的开端, 它是一系列前期研究的总结(《现代建筑》于 1976 年出版), 也是一系列新的研究的开始。所以卡齐阿托认为“威尼斯学派”于此时进入建筑词典, 是相当准确的。

在塔夫里的领导下, 威尼斯学派进入黄金时代。二十余年里这些学者们创造出了丰富的、令人难忘的知识财富——十余本专著、无数篇论文(发表在各种语言的国际刊物上)。这里既有意识形态批判的战斗檄文, 也有广阔视野的全球建筑文化探索, 还有艰深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研究。这些普遍超高质量的思想炸弹接二连三地冲击着学术界, 威尼斯学派也由此成为国际建筑学界的一块高地。即使在那些席卷一时的时尚建筑风潮最盛行之时, 比如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建构等等, 其理论家们都对威尼斯学派抱有一份崇高的敬意。不过在塔夫里于 1994 年去世之后, 威尼斯学派迅速滑向低谷。核心已逝, 盛况难再, 如今威尼斯学派已经成为一个历史名词。当然, 回顾这一学派的思想遗产在任何时候都是需要的, 尤其在意大利的历史语境中还原其理论探索与现实世界的微妙关系对于当下的研究来说无疑更有启迪意义。

无论是从 1936 年由萨蒙那开始的旧“威尼斯学派”, 还是 1968 年由塔夫里开始的新“威尼斯学派”, 城市都是研究焦点。首先, 这是建筑学科之现代转向的表现。意大利现代建筑的转向之路十分艰难, 由于历史原因, 意大利建筑的原始场地大多为历史城市——诸如威尼斯这样的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已具有完成形态的城市为数甚多。建筑一直都是联系过去与未来的中心, 所以, 它几乎不可能像某些欧洲国家那样顺畅地转向现代主义。由于另一个历史原因, 意大利战后对现代运动的接纳也有着巨大的阴影。以特拉尼(Terragni)为首的现代运动的倡导者和推动者的法西斯身份, 令战后的建筑学发展进退两难。萨蒙那于 1936 年在威尼斯的探索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将建筑经验与城市经验等同起来, 然后在此空间里探索现代运动和历史共存的可能性。其次, 这和意大利现当代社会史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因为战后的意大利, 就是一个城市规划不断堕入深渊的意大利。这一点已经不再只与专业相关, 它影响到每个

意大利人的生活。

自1945年意大利最后一个国王下台而宣告君主政体结束后，意大利共和国内一直都是政治党派激烈角逐、肉搏连场。战后重建是一项迫在眉睫的要务，50年代意大利出现“经济奇迹”则给所有人带来希望。但是无论是重建工作所兼带的建设任务，还是经济奇迹所创造的良好的心态环境，都没有在政策上获得同步的支持。放任的经济政策（*laissez-faire*，有点类似我们现在的“粗放型”政策）产生了一系列不良后果——建筑失控、与黑手党签约、非法建造……社会状况如此混乱和复杂，城市规划法规也同样的脆弱、漏洞百出。战时的1942年，第一部城市规划法在意大利通过。时代在经历巨变，规划法要与时俱进却异常艰难——1953年才发表了新城市规划法的第一个目录。在此背景下，战后出现的一些建筑团体都不约而同地表现出对城市问题的强烈关注。1945年成立的“建筑研究运动”（MSA）是温和协调派，它主要承担国家重建的工作。其控制方式有两种：城市规划（包括都市化进程的管理）和预制配件工业化。它的成员在一系列城市计划的项目中表现出对相关问题的思考：计划作为调停关于土地的社会矛盾的方法，赋予控制不动产的方法以重要性，区域主题、关系的组织以及在城市不同部分之间功能的合理配置。1944年成立的“有机建筑协会”（APAO）是政治激进派，和MSA的方向完全不一样，它的领导人塞维主张城市规划和建筑的自由。由APAO成员参与的INA-CASA的项目，就是对和谐的都市规划思想的公然反对。

60年代，意大利出现了中间和左翼势力试图合作的微妙局面，当时的建筑业积极将自身纳入到即将成为未来希望的中左联盟中。塞维在1959年建立的“国家建筑学院”（Istituto Nazionale di Architettura）就是这样一种组织，该学院包含了建筑各阶段所涉及的人，从建筑承包人直到建筑师。还有一些比较激进的团体，比如莱奥那多·本奈沃罗（Leonardo Benevolo）、阿尔纳多·布鲁斯基（Arnaldo Bruschi）、马里奥·伊利亚、卡洛·麦罗格兰尼（Carlo Melograni）和萨蒙那等人成立了“建筑与城市规划协会”（Società di architettura e urbanistica，缩写为SAU）。他们有着极端左翼和共产主义倾向，希望攫取权力进行变革，然后质疑职业手段。另外，还是学生的塔夫里及其朋友在1960年一起成立“城市规划师与建筑师协会”（Associazione Urbanisti ed Architetti，缩写为AUA）。他们的宗旨是拥护实际改革和现有状况的改善。他们也希望借此参与进在当时的罗马甚至意大利全国正进行的城市保卫战中。无论他们

的宗旨有否区别，社会责任、政治意识和专业知识都已经处于相等的位置上（甚至更为重要）。

这些政见不一的团体聚焦于一个重要的事件上。中左政府的天主教民主党人菲奥伦蒂诺·苏洛（Fiorentino Sullo）在1962年起草了一部城市法——《苏洛法》（*Legge Sullo*）。他试图以此控制城市的发展与规划，控制地产投机行为。这激起了右翼政党、小地主和建筑业的群起攻之。为了不影响之后的选举，不安的天主教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及时刹车，停止了苏洛城市法改革计划的实施，他们甚至出尔反尔地表示，“城市法只是苏洛的个人想法”。这一事件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国家城市规划学院（Istituto Nazionale di Urbanistica，简称INU，成立于1930年）为执行这一法律发起了战斗。无论是SUA还是AUA，这些团体都不同程度地卷入其中。但右翼势力的强硬和中左政府意志力的薄弱，终究使得该法的执行以失败告终。而那些团体也随之逐渐解散。

在这个风云变幻的宏大社会图景中，我们已经看到一些熟悉的身影闪现于其中——塞维、萨蒙那、塔夫里……他们对城市问题的关注形式在这段时间（战后到60年代中期）里大多以实践斗争为主，理论研究为辅。而且这部分理论研究也是直接针对意大利的现实语境。比如塔夫里在1962年写的“1945—1961年的罗马建筑事件”就是关于战后到60年代的罗马建筑史与城市史。更有影响力的1959年出版的萨蒙那的《城市规划及其在一些城镇中的实施》与1964年出版的艾莫尼诺的《现代城镇的起源与发展》也是同一类型。研究幅度最大的当数罗西（Aldo Rossi）的《城市建筑》。不过他的最终立足点在于建筑设计，而不是历史研究。所以，尽管城市问题一直都是知识分子们的共同事业，但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历史与理论研究直到1968年之后才得以展开。

1968年，塔夫里来到IUAV，迅速开始其大规模的历史研究工作。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则是，若干个“历史工地”同时打开，即使这一年极其疯狂的第34届威尼斯双年展（罢工、罢课、游行、巷战……）都无法转移塔夫里的视线。这并非因为塔夫里已经厌倦了这种外在的身体抵抗行为，而是对于此时的他来说，历史研究已经成为另一种政治斗争。

1962年的《苏洛法》和中左政府的失败极大地触动了塔夫里。他感到进步知识分子对社会变革的参与不再有效，并且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这些知识分子在专业上的不

诚实和刻意扭曲。尤其是1964年塞维策划的米开朗琪罗一波普展，它表现出的“操作式批评”就是左翼知识分子在面临现有的政治困境时不惜改变历史真相的权宜行为。这种做法虽然在眼前的政治斗争中无可厚非，但是塔夫里感觉到其中隐藏的危害性——对历史的真诚都失去了基本的信仰，还怎么可能成为对历史真正有推动力的人呢？塔夫里发现为知识分子提供一个全新社会身份的时代近在眼前。从他个人角度来说，成为一个研究“真实的历史”的历史学家是紧要之事。

“真实的历史”就是为历史“去魅”。为历史“去魅”的最终目的是为“知识分子”的身份去魅——只有正视过去才能正视自我，只有为历史去神秘化才能对左翼运动进行深刻反思，只有完成了对自身的去神秘化，才能为知识分子的新职责重新定位。

为历史去神秘化并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塔夫里的做法相当有成效。首先，开发若干新的历史工地。最初建立的是欧洲及苏联的先锋派研究与美国研究两大场地。随后是维也纳和法兰克福等城市的研究，1973—1975年提出过一项更大规模的研究计划——涵盖所有魏玛德国的城市的集体研究计划。这个计划半途夭折，但是促成了一项70年代末意法合作的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建筑的研究。1976年之后关于意大利的都市政策的研究分量增加：关于威尼斯造船厂的大型研究和里阿托区的研究。这些场地在当时几乎都是未开垦的处女地：在1973年《美国城市——从内战到新政》出版之前尚未有过专门的美国城市史的写作。这些研究的视角的独特、思维的强度、对资料的占有深度，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都难有比肩者。另外，在这些场地中，建筑、城市、历史三者融为一体。城市是稳定的背景，是资本主义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产物。它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关系最佳的物质载体，取代了建筑原有的意识形态的传输功能，由此取消了建筑的学科存在基础。当然，建筑的普遍状态证明了这一点。与此同时，它的某些偶发性现象（以杰出的建筑师为代表）也在潜在地抵抗这一状况：在美国是赖特（Frank Lloyd Wright）和“纽约五”，在德国是门德尔松（Mendelsohn）和哈林（Häring），在法国是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在意大利是皮拉内西（Piranesi）。苏联和某一特定时期的维也纳与魏玛德国作为新大陆和欧美相对照。它们是现代性发生的异在之地，也预示着某种未来。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相当明确的历史周期当中，从启蒙运动到20世纪。塔夫里所选择的每一块历史工地都有建筑、城市、历史的交织，而背后更为缜密的网络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现代性这些观念的构成。大致来看，这里最主要的成就有1971年出版的《社会主义、城市、建筑——苏联1917—1937年：